

“斗争的交响”与想象的“中国”

——从国族问题出发重读《财主底儿女们》

汪星爱

摘要 从国族问题出发重读路翎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可见“中国”概念的独特呈现与人物的国族想象。小说中“中国”一词常突兀出现在人物言语与心理中，打破日常叙事，构成复杂交错的国族想象图景。蒋纯祖的国族想象在现实的锤炼和爱欲的考验下不安地摆荡，昭示着全书所展现的个体与国族的复杂关系。小说以人物精神世界书写历史，展现国族观念建构的动态过程及其对主体成长的塑成作用，虽存在过度依赖主观想象的局限，却生动呈现了战时知识分子的国族意识与心灵困境。

关键词 路翎 《财主底儿女们》 胡风 主观战斗精神

作者汪星爱，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5)10-0164-11

只要在阅读中稍加留心便不难发现，《财主底儿女们》（下简称《财主》）在叙事中经常提及“中国”二字。这似乎并不值得称之为一种发现，因为路翎在题记中就已自白：“我所检讨，并且批判、肯定的，是我们中国底知识分子们底某几种物质的、精神的世界。这是要牵涉到中国底复杂的生活的……”^① 独特之处在于，文本中的“中国”一词经常全无征兆地突然出现在人物的日常言语和心理活动中。上部的核心主人公蒋少祖从日常生活出发的思考，就时常以“中国”作为载体和终结。面对旧情人，蒋少祖的感叹是“王桂英，在中国，生活是很艰难的啊”^②；祖宅被售卖的雪夜，又引出了他“为什么要做一个现代人？为什么要成为一个中国人”^③ 的发问。而在下部主人公蒋纯祖的人生重要节点上，“中国”都无一例外地突然从他的思考和言谈中跃出。在经历了种种激荡与挫折后，这个年轻的生命消逝在一个平凡的黑夜里，他的临终遗言是：“我想到中国！这个……中国！”^④

对读者而言，原本沉浸日常生活叙事中的阅读体验被突如其来的一“中国”一词打断了，我们被迫跟随人物对当下的情节做出家国意义上的反思。然而，这种反思又常常是无疾而终的——将目光投向上下文，我们并不能发现任何线索指向这一思考，“中国”似乎是仅在人物脑海中乍然迸发又即刻消失的灵光一现。如何看待长篇小说中出现的这种叙事奇观？作者对于国族主题究竟抱有怎样的热情、挣扎和思考？本文试图沿着上下两部的叙事脉络，通过追踪“中国”及其近同义词在小说文本中的不同呈现方式，考察各类人物的国族想象和观念，顺便探讨胡风路翎文学研究的一个老问题，即“主观战斗精神”。

一、“斗争的交响”：“他”与“她”的“中国”想象

伴随着民族主义研究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民族、国家这类宏观概念往往在民族成员的思维意识中

^{①②③④}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23、384、970页。

占据着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比如安德森那个著名的判断：“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① 在相近的时期里，中国学者也尝试对“中华民族”做出类似的定义：“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②，其中所谓“自觉”便指向主观意识在国族概念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当然并不涉及客观上统一民族形成的问题）。作为一部虚构的文艺作品，《财主》则尝试用文学的笔触绘制一幅由人物“想象”交织而成的中国图景。不同于《子夜》描绘吴老太爷的葬礼上吊客们对前线战事的各抒己见，也不同于《四世同堂》铺陈小羊圈胡同内居民们对日军进占的不同反应，《财主》不甘于仅仅停留在人物的外在言谈，而是要借此“突入”他们的内心独白。这种心理挖掘又并不总是指向鲁迅所关注的相互隔绝的个体几乎无意识的灵魂深处，乃是十分固执地频频指向正在战时公共空间中不断建构着的“中国”。由是，我们看到的那些时常错位、并非直接交锋的痉挛狂热的自言自语，其实正是他们此起彼伏的国族想象所谱写的一曲“斗争的交响”^③。

（一）激昂的高声部：青年男性的国族想象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现代“中华民族”一词和概念，在舆论的引导之下，成为各种媒体中出现最为频繁、最能激发国人抗战斗志、最易为国内各种政治势力所接受和乐道的时代词汇。^④ 当我们听见青年蒋少祖面对被炸伤的士兵在心中默念“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⑤，听见年幼的蒋纯祖激励自己“我一定要好好地做人！好好地，为了祖国，为了人类”^⑥，这部交响曲中激昂响亮的高声部随之而来。毫无疑问，这是整部乐曲中无法忽略的主旋律，它嘹亮地与日军进占中国的炮火声正面相争。在这一声部的引吭高歌里，“中国”主要呈现为一个以侵略国为他者的民族共同体形象。

热烈地爱着王桂英的青年夏陆同样“对于中国底未来”“抱着大的热情”^⑦，一旦与王桂英的爱情破碎，英雄主义的时代抱负迅速占领上风：“中国啊，这是何等险恶的夜里！我们随时都可以死去！……为了这一代的无数的鲜血头颅，不必记着女人和男人，多么简单！”^⑧ 上一刻还沉浸在失恋情绪中的夏陆遽然爆发出朝向“中国”的呼喊，看似突兀，实则是民族主义感情代偿了爱情缺失后的心灵空虚。类似的，另一位热血青年陆明栋刚刚出走故家，便突然动情而严肃地吟诵起“在诗篇上，战士底坟场，会比奴隶底国家要温暖，要明亮”^⑨，这位从小生活在母亲庇护下的少年用诗篇化的国族想象来激励自己前行。在胡风看来，“由于战争，人民被卷入了热情的高扬和处境的激动里面，迫切地要求对于人生的认识，敏感地接受对于人生的感应”。^⑩ 路翎敏锐地捕捉到了青年们因战争而时刻激动的时代心理，国族想象近似于一种感性的生命体验而非理性的认知结果。

这的确和安德森的理论表述不谋而合：“正是这种友爱关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⑪ 旷野中的蒋纯祖与伙伴们在饥饿困顿中一起唱军歌时，心里就会由衷地升起对祖国同胞的痛切想象：“在这种歌声里，他们底同胞，一切中国人——他们正在受苦、失望、悲愤、反抗——在生活。”^⑫ 路翎忠实地记述了集体性想象的生成机制，但无意让《财主》为读者提供建构爱国主义想象的印刷资源。书中唯一一位真正为民族战争“从容赴死”的角色汪卓伦反复拷问着这种想象的合理性。沉溺在对海军部乱象的失望与反省里，回到家中面对病妻，汪卓伦才如梦初醒般感叹：“我才注意到，这里是桌子，晚餐，纸花，她，不是什么国民，社会，那些意义原是虚伪的，我有什么要求？——只有这一切，我底一切，这才是真实的。”^⑬ 在无法逃避的琐碎日常面前，关于民族命运的畅想忽然成了餐桌外遥不可及的存在，宏大的思考失去了它应有的立足之地。汪卓伦的徘徊和犹疑在这一声部中唱出了一个不谐和音，预示着青年人一腔热血的民族想象或许只是涉世未深的心血来潮，难以经受住现实生活的考验和锤炼。

^{①⑪}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7页。

^②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页。

^③ 路翎在《题记》中写道“我所追求的，是光明、斗争的交响和青春的世界底强烈的欢乐”，《财主底儿女们·题记》，第1页。

^④ 黄兴涛：《重塑中华 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1—53页。

^{⑤⑥⑦⑧⑨⑩⑪}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39、415、44、193—194、602、519、320页。

^⑩ 胡风：《现实主义在今天》，《胡风全集》第3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9—40页。

(二) 芬杂的中声部：中年男性的国族想象

蒋家的一众中年男性又代表着另一类国族想象。他们倾向于积极地思考自己在政治共同体中扮演的角色，并相信自己具有参与改变其前途命运的力量。

在这一方面，书中着墨最多的无疑是蒋家的次子蒋少祖。他“处在当代中国底最激动的社会圈子里”^①，数年来参加了各种形式和规模的政治团体和活动，但读者却很少读到蒋少祖在这些团体中参与实际政治决策的事实性情节，唯有他头脑中进行着的意识斗争反复得到重述。少年时期的少祖对国家政治抱有一种正向期待，而这种观念是通过鄙薄亲眷们的庸俗政治论调而达成的。中年之后他怀抱避世怀旧的政治理念，是脱胎于对以弟弟蒋纯祖为代表的青年们的不屑。当他逐渐脱离政治中心之后，就更加断定青年们心怀“幼稚的急进思想，强烈的虚荣心和浮薄的态度”，而他自己才是“让失望的母亲、无父的孤儿、沉默的牺牲伴着真正的中国，伴着我”^② 的担当者。他对中国的想象往往建立在一种孤芳自赏的思维形态之上，对“自我”的肯定与认知必须诉诸对“他者”的否定与排异才能完成。

排他的本质是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蒋少祖对中国的构想正是一种以自我为原点的想象，这在他与陈独秀、汪精卫的会面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对陈独秀的同情与尊敬，变成了对自己的同情尊敬”^③；“他差不多已被蛊惑，相信是汪精卫和他，蒋少祖在创造着中国”^④。面对处于政治权力中心的人物，蒋少祖不假思索地将自己代入与之同一的地位，人物看似在构想中国，实际上是在构想自己在其中的权威地位，所谓“中国”不过是人物借以投射自我的对象物。不只蒋少祖，这种自我投射的政治想象是一众人物在乱世中抵御虚妄、努力寻求自我意义的方式。陆牧生总结“政治是个反来复去的东西……四个字：升官发财”^⑤，为的是希望儿子服从他自己的社会经验；资本家王定和一向“不信任中国能有出路”，却“只在他底利益发生了危机的时候，他才提到理想，国家，以及工业底前途”^⑥；留美归来的王伦则“认为中国底希望是在懂得欧美的年轻人身上”^⑦，并因此劝说大家抛弃自己的愚蠢，信仰欧美式的政治理想……

由此，书中时常会出现一种场景，即蒋家一众亲眷聚在一起，各自发表对时政的看法。在家庭聚会的闲谈中，各人强烈的主体意识外化为言辞间的针锋相对，每个人都力图用自己的观念压倒其他人。透过人物间的意气之争，路翎向我们呈现出了在战时语境下建构一个政治共同体的举步维艰，由于民族成员之间有意识地互相驳斥，一个完整而统一的共同体形象似乎难以在舆论场域中形成。

(三) 幽婉的低声部：女性的国族想象

除此之外，作者还特别关注到了女性人物的国族想象。相较于男性知识分子，叙事者是这样概括女性人物的国族思考的：“在蒋秀菊心中，发生了对国家的热情；但主要的是对朋友的为朋友辩护的热情：妇女们，只有在这些地方，才能感觉到国家，而一感觉到就对它发生爱情。”^⑧ 王桂英热爱战争时代，因为“平常的生活已经脱离。她认为她从此可以得到那种浪漫的生活了——由于热烈的想象，她把医院里的艰苦的服务认为是浪漫的。”^⑨ 演员高韵沉耽于演剧团的两性生活中，却自认为“戏剧运动是无比伟大的，她，高韵，在拯救中国”。^⑩ 类似的，自诩新女性的金素痕“谈法律、政治、谈张学良和汪精卫”，不过为了彰显自己的精英品格；从不关心政治的沈丽英在汪精卫遇刺后感到“非常怜悯汪精卫”，原因只是“觉得流血是痛苦的”。无论哪类女性人物，都未被赋予独立思考国家问题的能力，她们无法和蒋少祖、蒋纯祖等人一样长篇独语地辩议“中国”，对国家的短暂热情只被轻率地归因于“浪漫”“怜悯”等相当感性的因素。

相比之下，作者更倾向于记述蒋家女儿们对苏州旧家的念念不忘：蒋淑华的临终遗言是“无论如何，我总是我爹爹底女儿”^⑪，蒋淑珍在流离失所的途中“想念苏州，想念梅花、果园、风雪的夜和沉静的炉火”^⑫，被卖作他人妇的蒋秀芳出逃的动力是“目前的生活愈可怕，她底对她底蒋家的理想就愈坚强”^⑬……在明显缺乏理性国族思考的女性角色身上，对故家的依恋已经显然超出了单纯的乡愁，转而成为逃避无望的现实生活的精神出口。在这一意义上，“蒋家”象征着传统中国及其伦理秩序，构成了曾经的闺秀们存放归属感的唯一寄托。晚年沉溺于“旧中国”理想的蒋少祖总是絮絮低语“我爱我底父亲，我爱我往昔的爱人，我爱我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 332、607、645、650、599、743、746、658、47、679、420、590、754 页。

底风雪中的苏州底故园”^①，同样昭示着这种象征关系。

邓腾克认为“五四语境中，‘离家’是典型的现代行为……但是随着战争的开始，国与家都受到了威胁，家庭，开始成为国家统一和反抗的象征”，执着于书写蒋纯祖离家的《财主》被他视作复归五四精神的“时代的异类”^②。这种观点的确抓住了全书“反封建”的主题，但却忽视了其背后的复杂性。蒋家女儿们的价值方向始终指向“归家”，蒋家也并不像《雷雨》《家》中的旧家庭一般令人窒息，仅从上部的重头戏——蒋家齐心协力对抗金素痕——就能感到，这个大家庭不仅不“吃人”，甚至还存续着某些伦理的良性联系。全书尽管以蒋纯祖批判旧中国为落脚点，却也忠实地展现出了新旧交替、家国碰撞的时代里那种犬牙交错的生活原貌。这恰出于作者的自我定位：“我把《儿子们》放到滚动的多面的生活里去之后发生的，……别人写他们底一面，判断他们没落，那空气沉闷，不像生活；我写他们多面，知道他们将来如何，觉得美。”^③

二、“走到这种生活底深处去”：蒋纯祖的国族想象

1942年11月，在重写《财主》期间，路翎写了一首长诗《致中国》，诗中的中国有着奇诡的面貌：“老头子啊 你是在打瞌睡 什么都不知道/但终于你醒来——我看着你！——打哈欠 流鼻涕/刮光了半边脸/另一半却留着发臭的胡须”^④。在诗作中，“中国”是一个半边光洁半边发臭的“老头子”，他对这一形象交织着“信仰”“爱情”“仇恨”，即便“可怕”，最终却仍要“亲吻”。可以说，此诗所展现出的那种激荡在两极之间的国族想象，构成了《财主》中多数人物精神世界的蓝本。

在丁字型叙事结构^⑤下，小说上部中，作者可以将这多维的想象错杂地分散在不同人物的精神世界里，在下部，则必须全然收束在蒋纯祖一人身上。更重要的是，与兄弟姐妹们在闺阁书斋里构想自己的中国不同，蒋纯祖深知“知识分子们，应该摒弃一切鼓吹、夸张和偶像崇拜，走到这种生活底深处去。”^⑥当他准备离开蒋家前往上海时，在空荡的大街上喊出“中国，不幸的中国啊，让我们前进”^⑦；当随演剧队向重庆出发时，他由衷地生发出“旧的中国被打垮，被扫荡了，他们底新的中国便可以毫无障碍地向前飞跃”^⑧的豪情壮志；而在演剧队遭受孤立之后，他最终“想到了荒凉的乡下，想到了穷苦的农村和沉默的人民”^⑨，才因此选择来到石桥场、走向他心目中的“人民”……正是关于中国的想象和为中国献身的冲动驱使蒋纯祖离开一处、迈向下一处，用书中的话说，他时刻感到“这个时代监督着他”^⑩。

（一）想象与现实

我们首先需要关注的是这多面的现实生活究竟如何改造了蒋纯祖的国族想象。一个最直观的规律已然被发现：“蒋纯祖在每一阶段开始时都带着某种先入之见，然而这些先入之见在蒋纯祖加深经验的过程中最终显示出它们的错误性。”^⑪的确，每到一处新的场域，作者都会有意安排一些角色，他/她并不一定与蒋纯祖发生实际的交往，但却会作为“现实”的象征符号出现在他的视线里，让他在旁观中得到思想意识上的冲击。旷野旅途中，刚从战场生还的团长被散兵流勇枪杀，相信“他就是他底国家”的军官在嚎叫出“你们，对不起中国啊”便撒手人寰，这让曾经对中国军人怀抱着热切崇拜的蒋纯祖深受震撼^⑫，作为旁观者的他“含泪看了团长和兵士们底尸体”，陡然失去了判断的立场和能力，对于“中国”的崇拜也在这一刻变得摇摇欲坠。类似地，在石桥场上，当蒋纯祖得知乡妇胡德芳为了生计要给母亲下毒、最后又阻止母亲喝下毒药后，他无比期待在胡德芳身上看到人民的心灵的光辉，但他事实上看见的只是“一个女人，她疲乏，对他生怯，对赵

^{①⑥⑦⑧⑨⑩}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672、821、447、673、741、741页。

^② 邓腾克：《路翎笔下的蒋纯祖与浪漫个人主义话语》，姚晓昕译，《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0年12月。

^③ 路翎：《致胡风书信全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59页。

^④ 路翎：《致中国》，《泥土》1948年第5期。

^⑤ 王宏图：《家国叙事与个体精神叙事的叠合与断裂——从〈财主底儿女们〉为出发点看中国小说的叙述特质》，《学术月刊》2020年10期。

^⑪ 舒允中：《内线号手：七月派的战时文学活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158—159页。

^⑫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523页：“‘同志，我知道你是一位中国底军人，中国在危险，……我尊敬你们！’蒋纯祖，在那种迫切的热情里，说，企图表现自己底善良，而以伟大的、悲苦的中国感动这位旷野中的英雄。”关于军官的情节，见第528—534页。

天知亲切，使一头狗舐小孩屁股”。^① 作者所擅长的精神世界的记叙在这里发挥了作用，它将与“理想”相悖的“现实”内容浓缩在一个又一个的人物装置里，让他们依次与蒋纯祖相遇，并抓住蒋纯祖观察他们的机会进入他的内心图景，借机描述出他精神上的震动与变化，从而实现用“现实”锤炼“想象”的目的。

当然，蒋纯祖并非仅通过“观看”来理解和把握现实，只是相较于其他现实主义写作，作者更在乎描述人物的“世界观”，认为这才算“抓住其整体的内容（社会生活的），才是活的生活形象”，在他看来“一个人究竟是怎样做法，是被他底社会集团——世界观决定的”。^② 那么问题在于，如何搭建起“世界观”与人物“行为”之间的桥梁？如果说现实的确改变了蒋纯祖的想象，那么这种改变通过何种形式外化在他的行动中？书中有一个重要的人物起到了这个作用，那就是蒋纯祖在旷野中遇到工人的朱谷良。他既是民族战争的实际参与者，也是一个历经磨难却仍然信仰正义的人，因此，路翎表示：“至于朱谷良，这机器工人，后来的游击队支队长——这是被作为一个完成了的人，一个英雄在写着的。”^③ 与朱谷良的相处是蒋纯祖成长的重要环节，他一度认为朱谷良是“无人性，并且无灵魂”^④，但最终被朱谷良的牺牲所折服，并发誓要像朱谷良一样把自己完全“献给这个时代”^⑤。朱谷良作为作者设想中“一个完成了的人”，他的出现先改造了蒋纯祖关于国族的世界观，接着又被凝缩为一个象征时代号令的抽象符号，反复地出现在蒋纯祖的各个人生阶段：他总是毫无预兆地梦见朱谷良，“作曲纪念朱谷良”^⑥，“想到了朱谷良”^⑦，“取出那一条在旷野中染了血迹的裤子”^⑧……伴随着“朱谷良”的乍然跃出，蒋纯祖总会立刻从堕落中醒悟过来，力图摆脱情欲的沉沦，向着时代的号召进发。作者借此完成了从改变人物观念到扭转人物行动的跨越。

这个跨越在国族认知这个宏大的话题下的确显得轻率了些。蒋纯祖的国族想象无论是被击碎还是被重建，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是因为具体地参加社会活动，或是深入地发展社会关系，而仅仅是通过他在头脑中把某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个体人物对象化乃至抽象化、神圣化这一方式来实现的。这种想象方式使得作者不得不创造出一个个“完成了的人”展现在蒋纯祖面前，而非“生活着的人”“发展着的人”，唯其如此才能起到形塑主人公国族意识的作用。但如果与蒋纯祖交往的人物都以抽象符号的形式在主体意识中发挥作用，那他所经历的现实的“现实”性就值得怀疑了。换言之，蒋纯祖看似经历了多个地域和人生阶段，但他其实始终未曾真正地与之发生“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⑨，因为多数情况下，他与现实的关联只处在认知而非实践的阶段，仅有的一些实践内容还未得到展开就迅速萎缩。难怪读者会感到蒋纯祖在面对许多重大问题时“更像一个架空的思想者”^⑩。比如，在历经颠沛后回到蒋家时，他又一次在姐姐蒋淑珍身上看到“什么是封建的中国底最基本、最顽强的力量，在物质的利益上，人们必须依赖这个封建的中国”。^⑪ 想象仍然需要以身边的某一特定形象作为借力点，这既是角色也是作者的思维惯性。

不过可贵的是，作者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在创作阶段，他就曾“决定不使朱谷良再遇着蒋纯祖了：那除了牵强之外不会加重小说底氛围的”。^⑫ 可见他自己也感到了这种设计的局限性和牵强感。虽然后来作者还是选择让朱谷良与蒋纯祖相遇，但一如他自己所承认的那样“这些弱点，是可以作为一种痛苦的努力而拿出来的”^⑬，因此他仍然尖锐地把这个想象的难题摆到了台前：“蒋纯祖愈想象，便愈不能感到朱谷良；他觉得这是可怕的事。这个时代发出了向人民的号召，蒋纯祖想象朱谷良是人民，感到朱谷良；想象朱谷良是自己，有着和自己底同样的心，感到人民；蒋纯祖有大的苦闷。”^⑭ 一方面，朱谷良是蒋纯祖想象“人民”的借力点，但另一方面，曾经与自己寝食同步的朱谷良又是那样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鲜活生命，与遥远而模糊的“人民”概念全无半点关系。虽然作者无力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式将想象和现实结合得更紧密，但却恰恰描绘出了青年知识分子在个体和共同体、想象和现实之间举棋不定的认知困境，它指向现代国族观念形成过

①④⑤⑥⑦⑧⑪⑫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 846—847、507、551、624、732、741、923、624 页。

② 路翎 19441214 致逯登泰信，张以英编：《路翎书信集》，桂林：漓江出版社，1989 年，第 92 页。

③ 路翎 19410202 致胡风信，《致胡风书信全编》，第 32 页。

⑨ 胡风：《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胡风全集》第 3 卷，第 187 页。

⑩ 赵园：《艰难的选择》，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年，第 337 页。

⑫ 路翎 19410317 致胡风信，《致胡风书信全编》，第 35 页。

⑬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题记》，第 2 页。

程中主体所必将遭遇的“情感和理智的冲突与融合，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与调适”^①。相比于直接赋予人物某种既定的人格理念，作品所“肯定”“宝贵”的正是人物在追寻这一理想的过程中遭遇的徘徊与自我怀疑。因此，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蒋纯祖仍然坚信自己“没有在生活里沉没”，并且“好像听见了全世界的鼓掌声”^②，那是人物更是作者为大时代里不安的生命献上的赞礼。

（二）想象与爱欲

有研究者认为，在《财主》中，“所谓对新世界的渴望、对旧世界的离弃，暗含的是对情欲自主的渴望”，而“战争所激发的‘生与死’主题作为一种戏剧表现，与此后主人公的爱欲迷思没有任何关联”^③。由于战争与恋爱在客观情节上的剥离，作品的确很容易带给我们这种阅读错觉。但当我们换一种思路，从人物想象和认知的角度去理解书中的国族主题，那么就会发现，主人公的恋爱与他的国族想象恰恰是紧密纠缠在一起的。

蒋纯祖的国族认知极大地影响了他对恋人的想象和对爱情的态度。下部第六章，蒋纯祖加入了武汉的一个合唱队，其间与外甥女傅钟芬和合唱队员黄杏清发生了一段暧昧不清的三角恋。在此之前，蒋纯祖“企图投效空军”却未能得偿所愿，它直接打击了蒋纯祖对于政治实践的雄心壮志，强烈的英雄主义情怀在挫折下萎缩为“道学的思想”“复古的思想”，他开始和蒋少祖一样信仰“古代底伦理、观念和风习”^④。以此为缘由，他放纵自己的欲望，“把自己的恋情和中国底那些陈旧的才子佳人的故事联结了起来”^⑤，将暗恋的黄杏清视作一个纯净而神圣的、古典主义的膜拜对象。同样的剧情发生在演剧队。当他遭到演剧队领袖的羞辱和孤立、对政治团体的想象陷入认知危机之后，他主动地选择了与女演员高韵发生肉体关系，由此陷入了情欲的漩涡。性行为前夕，蒋纯祖的心理活动是这样的：“难道我这样做是错的吗？或者有一点错吗？……我宁可毁灭了自己，也不愿去顺从，去过我们中国底这种昏沉的，黑暗的生活？……我是严肃的，那么，让这个社会群起而攻打我吧！”^⑥每一次国族信仰的坍塌带来的受挫体验都会激发蒋纯祖对于时代命令的逆反心理，而性欲的宣泄是表达逆反最直接的方式。也就是说，每当蒋纯祖对国族的正向期待进入低迷期，隐藏在主体内心深处的情欲便会伺机而出，暂时在其思维意志中占据主导地位。对他而言，国家主义的号召和个人难以克服的欲望几乎是人格的一体两面，它们此消彼长地搏斗着，只要他摆脱情感的羁绊，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又会立刻夺回主导权：当他得知黄杏清已然结婚、甚至也从未爱过自己这一事实后，他立即“脱离了痛苦的道学思想和奇怪的感伤，永不愿记起它们了”^⑦。当他眼见情人高韵与剧作家厮混，便突然从长时间的荒淫中惊醒过来，决定走向“穷苦的农村和沉默的人民”^⑧。

对于这两股相互搏斗着的力量，无论是作者还是主人公，心里始终怀揣着既定的价值等级。在上部，叙事者已经代替蒋少祖道出了这个时代的集体宣言：“遵照着人类底教义，政治底情热和民族底悲愤是具有着绝对的权力来轻蔑青春底奢华和嬉戏的。”^⑨然而，正如现实永远难以驯服蒋纯祖理想主义的虚荣心那样，沉重的时代号令也无法长期地抑制个人爱欲的满足。在这个问题上，路翎借蒋纯祖这个始终与自我斗争着的主体向我们展现了相当复杂深入的思考，除了上述与傅钟芬、高韵等人的恋爱游戏外，更着重地表现在他与万同华的交往上。在石桥场的村庄上，蒋纯祖认识了单纯美丽的乡村女子万同华，二人相爱并决定结婚。然而，令蒋纯祖痛苦的是，他对万同华的爱情与自己的“时代精神”时有冲突。首先，未受过教育的万同华无法理解蒋纯祖动荡的精神世界，“对蒋纯祖内心底那种所谓时代精神……万同华很冷淡；有时尊敬，有时不觉地仇恨”^⑩，这让双方都感到了痛苦与隔膜。更重要的是，蒋纯祖在万同华身上看到了他最厌恶和排斥的“中国”面向，即蒋少祖和蒋淑媛背后站立着的那个“封建的中国”——当万同华表示要与母亲商量嫁娶事宜时，蒋

^① 黄兴涛：《重塑中华 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第21页。

^{②④⑤⑥⑦⑧⑨⑩}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952、627、632、709、639、739—741、409、861页。

^③ 陈彦：《现代世界的“晚生子”与“碎裂时代”的写作——再论路翎与〈财主底儿女们〉》，《文学评论》2016年第4期；除此之外，王宏图也在其论文中表达了对这一观点的认同：“正如有些研究者敏锐察觉到的那样，蒋纯祖的命运遭际与抗战的历史背景有相当程度的游离，并没有严丝合缝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他行动的内驱力很多时候并不是外在环境的刺激，而是他强烈的爱欲冲动。”（《学术月刊》2020年第10期）

纯祖敏感地愤怒了：“又是一个和母亲商量，中国啊！”^① 在濒死的前一刻，蒋纯祖逼迫万同华为他念斯大林向德国宣战的文告，其实是在忧虑万同华将要“属于了那个致他死命的中国，……将要哺育儿女，操持家务，终于成为‘胡德芳’，而遗忘了他，和‘这个时代’”^②。以万同华为对象，落后的国族认知与情欲合二为一，蒋纯祖是以征服万同华的方式在征服着那“无声的，荒凉的中国”^③，试图借此弥合情欲与时代责任之间那道巨大的鸿沟。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对万同华的爱不是没有占领过上风。蒋纯祖曾不止一次地发现“他不再能够相信，使他爬了起来的，是这个时代底命令，壮志，和雄心。他很明白，使他再生的，是一个忠实的女子，是那一份爱情”。^④ 这份挣扎同样存在于二姐夫汪卓伦的身上，尽管他最后带着对亡妻的爱走上了战场，但妻子蒋淑华的死也曾一度让他堕入颓废，不愿意理睬国家大事。每当这些时刻，主人公乃至作者自己都会陷入思维的漩涡，困扰他们的问题是，宏大叙事自带的压倒性权威是否有权利取消战争年代一切关乎“人”的本能的价值？借助“自我斗争”的创作形式，路翎其实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大胆的回应。在战时（尤其是左翼）文化宣传语境中，关于国族意识的一组组二元对立包含着天然的不对等关系：想象应当由现实改造，个体利益应当为集体利益让位，主体欲望应当为时代责任所克服……这种种外部强加的二元等级制构成了蒋纯祖内心的第一个声音，它迫使蒋纯祖从想象的虚荣、肉欲的沉沦中挣脱出来，走向他心目中的荒凉。但《财主》的特殊之处就在于，“蒋纯祖心里有另一个蒋纯祖”^⑤，他代表着那些被文明遏制的本能因素^⑥（情欲、虚荣心、个人享乐），它们尽管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却具有一种野性的生命力，敢于站出来质疑中心理念的权威意义：“这是我第一次批评神圣的死者——我还差得很远，但我要生活！生活！生活！……这个时代的那些理论使人太容易地想做伟大的人，尤其是，在目前的这个圈子里，这种理论使人们盲目！”^⑦ 借蒋纯祖之口，作者批判了胡风所谓“僵化在抽象的（虚伪的）爱国主义”^⑧，同时更批判了这种站在道德制高点的爱国主义口号所造就的二元对立假象——为什么“生活”一定要和“伟大”的“时代”对立起来？为什么人们就不能和汪卓伦一样将对亲人的爱、对生活的爱有效地转化为民族情绪？如果再回看蒋纯祖辞世前那颇具象征意义的一幕，他对爱人万同华念诵苏联宣战书的极力要求，何尝不是他企图消灭二元对极间的互斥力量的夙愿？但这一举措最后以失败告终，万同华在这种逼迫下非但没有受到感召，反而觉得自尊心受挫，因此可以说，在《财主》中，路翎未能借助蒋纯祖这一人物完成对这种二元对立的破除。不过 1949 年后他在朝鲜战地的创作却延续了这一思考：当他笔下的志愿军战士们将对母亲、爱人、家乡的思念转化为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情感来源，其实也就成功地化解了蒋纯祖“举起全部的生命”来抵抗的精神危机。

三、另类的“史诗”：“主观战斗精神”如何表现国族历史

作为胡风文艺团体的一员，路翎以胡风提出的“主观战斗精神”为其创作的核心源泉——这已是路翎研究的常识。如上所述，在这种写法的指引下，《财主》中人物实际参与民族战争、体会国族现实的客观描述未能得到充分的展开，取而代之的是人物关注国族命运、体会民族创伤的每一段国族想象，即胡风所言“历史事变下面的精神世界底汹涌的波澜和它们底来根去向”^⑨。但《财主》中的“中国”不可能只存在于人物的精神世界中，它当然有着历史性的指涉内容，比如第十章的开篇这样写道：“汪卓伦在他底生活上最有发展的这半年，正是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暧昧地起伏着，日本强调亲善，全中国弥漫着焦灼的痛苦的，密云不雨的时期”^⑩，此后则有“蒋家底人们，忙碌着蒋秀菊底订婚；在订婚的早晨，传出了西安事变底消息”^⑪，“蒋淑华死去的第三天，爆发了卢沟桥事变”^⑫……叙事者有意识地将蒋家儿女们个人的命运节点与民族国家的生死攸关并置在一起，建立起一个由个人和国族所共有的时间轴。然而，这些真实的历史事件是否仅仅作为“背景”静态地矗立在人物命运背后？人物与国族历史之间是否“断裂”？更进一步，如果借用胡风的话，这另

①②③④⑤⑦⑩⑪⑫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 857、968、908、901、626、741、315、401、424 页。

⑥ 精神分析学说认为，“文明的存在正是依赖于对爱欲的广泛的、强化的管制和控制”，参见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黄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年，第 61 页。

⑧ 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胡风全集》第 3 卷，第 500 页。

⑨ 胡风：《〈财主底儿女们〉序言》，第 1 页。

类的“史诗”是否能够以文学的形式承载起民族历史的重量？

上部第十四章，作者让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入蒋家四女儿蒋秀菊的订婚宴，并选择让这场重大的事变通过不同人物的视角表现出来。大姐夫傅蒲生消极地判断“他被关在西安了！中国完了”，年轻的陆明栋不满于“中国要完了，为什么他们还唱歌”，汪卓伦冷静地报告来自军政部的消息，王定和激愤地表示支持国民政府对“七君子”的屠杀。之后，作者不吝笔墨地描绘了订婚者蒋秀菊一波三折的内心起伏，最后的感触是：“她不明白何以她不曾感到时局，何以这个国家这样的欺凌她。”到这为止，整场西安事变都不是以客观历史叙述的形式出现的，它被框定在人物的视线中展开，作者所描述的、读者所阅读的主要对象是蒋家人眼中的西安事变，作者讽刺的主要对象则是基督信徒蒋秀菊对历史认知的随意和漠然。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绝不仅仅是一连串经验性的可被证实的事件，它和“文本”一样需要被“解释”才能产生意义，“对历史的恰当的理解绝不应该视其为对过去事件准确无误的记录，历史毋宁说是象征结构，是膨胀了的隐喻”^①。在这里，路翎独特的创作方法恰恰触摸到了历史“事实”在各种不同的话语资源下被建构起来的动态过程，整一章节的文本交织了民族国家的宏观叙事、生活场景的真实描写以及人物心态的起伏变化，可以说是相当丰富地描述了西安事变的多个面向。

但历史不可能只是主观描述的产物，无论是西安事变还是书中涉及的其他历史事件，背后都站立着一个实际存在的“现实”。而且，一味地追求经个体想象过滤后的历史，显然也不符合胡风对现实主义描述历史的理论设想。在《论现实主义的路》这篇长文中，胡风系统地阐释了他心目中文艺界现实主义传统的来龙去脉，其中就深入地讨论了文艺应该表现怎样的历史这个问题。在他看来，真正的现实主义应该把“流贯着人民的负担、觉醒、潜力、愿望和夺取生路这个火热的、甚至是痛苦的历史内容”^②作为创作的核心对象，由此确保文艺既“能够把握历史的方向”、也“能够透过历史的血肉”^③。在《财主》下部，路翎用主人公见证南京城陷落的情节对这一理论做出了出色的实践。^④蒋纯祖在上海陷落后不得不跟随败军的脚步再次撤回南京，暂时在大姐家的原址避难（此时蒋家人均已逃离南京），并见证了南京被敌军的炮火摧毁的全过程。叙事者尽管也借蒋纯祖的视角直接描绘了全城陷落的悲壮场面，但他的落脚点显然还是在蒋纯祖的思想变化上。眼见大姐的旧家狼藉一片，目睹一个溃兵替抢劫小贩的战友付钱，听着远处的爆炸声，蒋纯祖从“自私地为了光荣”中顿悟，感到自己和很多人站在一起。如果把这段叙述和同为七月派的阿垅在《南京血祭》中对相同历史场景的书写做一对比，或许可以有更深的体会。在全方位地铺叙了日军进城时敌军轰炸、难民四散的画面之后，阿垅也将叙事目光聚焦在了“一个穿着黑布棉衣的老妇人”身上。^⑤通过阅读这位无名无姓的老妇人逃难的详细过程，我们感受到的是日军进城后手无寸铁的老弱妇孺遭到了怎样的虐待，也就是说，看似在写某一特定的个体，实则还是为了以小见大，展现城破之时日军的暴行和民众的遭遇。反观路翎的写法，生动而细致的历史场景书写最终收束于蒋纯祖“紧张的精神活动”，它的意义在于让蒋纯祖从一个想象中“浪漫的，热烈的世界”走向“战争的毁灭的世界”，最终为了表现出“这个善良的小雏，是这样地生长了羽毛了”。显然，作者在努力寻找着宏大叙事与个体之间的联结点，创作者有意识地将宏大的历史事件有机地编织进人物情感、性格乃至观念的塑成过程中，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的外部行动。

不过，读者们还是对《财主》中的战争书写提出了质疑。有人认为“如果我们剥离‘抗战’这一包覆于人物行动之上的‘历史外壳’，由人物行动所推动的那些故事与情节依然可以确立的”^⑥；或者认为《财主的儿女们》……对自己表现的历史范围内发生的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却没有怎么注意……往往在粗略地提及某些历史事件之后立刻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小说人物的个人经历上”。^⑦形成这种错觉不足为奇，因为与阿垅

^① 海登·怀特：《历史主义、历史与比喻的想象》，《后现代历史叙事》，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②③} 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胡风全集》第3卷，第500、492页。

^④ 蒋纯祖视角下的南京城破，参见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451—459页；朱谷良视角下的南京城破，参见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470—472页。

^⑤ 阿垅：《南京血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8—13页。

^⑥ 陈彦：《现代世界的“晚生子”与“碎裂时代”的写作——再论路翎与〈财主底儿女们〉》，《文学评论》2016年4期。

^⑦ 舒允中：《内线号手：七月派的战时文学活动》，第147页。

在整部小说中都正面地描写会战前线的激烈场面不同，《财主》此后对战争情形的展开，主要是借助溃兵流民的视角来表现的，比如“从福山装载了八吨要塞器材撤退的”军官徐道明在芜湖江面与日军展开的交战，就是由逃难途中的蒋纯祖亲眼目睹的。但事实上，路翎不是因为不擅长写战争而有意逃避，“从福山撤退”的前线场面他早在《“要塞”退出以后》就已经正面刻画过了，之所以他要在《财主》中选择这种独特的视角表现战争，其实是在尝试更深入地描绘战争背后的历史内容。在回顾朱谷良的生活历史时，叙事者又把历史的时间线拉回南京城破，这一次主要描绘了难民出城时人群拥挤成灾，逃生者不得不踩在同胞们的尸体上爬出城洞的可怕情形。这场浩劫给了朱谷良极大的震动，一种关乎民族存亡的“深刻的悲哀”从他压抑麻木的灵魂里生长出来，并在目睹一个陌生女子带孩子跳水后达到顶峰——“他以后的事业，便是……替这个跳水的女子复仇”。正是从此刻开始，叙事者认定他“知道这个民族比一切人更多”，他成了“英雄的朱谷良”，并有资格成为此后蒋纯祖心目中“神圣的死者”。在两次对南京城陷落的历史书写中，战争均被设定为一种具有起源意义的存在，它用最直观的方式对主体造成身心的巨大打击，随之而来的民族复仇情结从此根植于人物的观念中，构成此后朱谷良为正义亡命旷野、蒋纯祖为理想奔赴时代的源动力之一。用胡风的理论化话语来说，就是主体“把从战争负担来的痛苦压力转变为对于历史负担的觉醒，由这获得主动力和创造力，通过战争过程去减轻以至最后解除历史负担的愿望”。^① 历史在文本中的展开并没有因战争情节的隐匿而终结，相反，它扭结于以蒋纯祖为代表的一众人物的精神蜕变中，主体如何消化源初的战争体验，如何与战争时代的主旋律贴近、搏斗并融为一体，这个精神层面的过程才是胡风路翎眼中“在战争发展过程下面已经实现、正在实现、将要实现的真正的现实”。^② 因此胡风才在序言里断言，描写着“真实性愈高的精神状态”的《财主》是让“整个现在中国历史能够颤动在这部史诗所创造的世界里面”^③ 的。

从这种历史观中可以看出更深的理论底色。胡风之所以认为历史现实的本质就是“广大人民的负担、潜力、觉醒、和愿望”的连续性生成过程，是因为他格外重视“人”在历史和文学创作中的地位：“历史的要求只有通过人这‘感性的活动’去争取实现，只有变成了人的血肉要求才有可能深入客观对象，把握客观对象，克服客观对象（创造活动）。”^④ 在这种观念下，历史不再被看作一种外在于人的身外之物，换言之，历史就孕育于“人”之中，“人”又反过来构成了历史。落实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就需要“向感性的对象深入，深入到和对象的感性表现结为一体，不致自得其乐地离开对象飞去或不关痛痒地站在对象旁边”^⑤，这样才能切近历史最核心的内容。路翎在他的能力限度内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全书最开始写蒋少祖与王桂英的交往，是以一·二八淞沪抗战为背景的。对蒋少祖而言，“一·二八战争使他经历到空前的兴奋和紧张。先是热情的迷惑和骚乱，然后便有了傲慢的、冷淡的、顽强的心情”。^⑥ 而“王桂英底赴上海，是一·二八的光荣的、热情的战争所促成的多种行为之一”。^⑦ 事实上，在创作《财主》时，路翎对上海的正面描述远不及苏州、南京、重庆来得细腻真实，这是因为在此之前他尚未抵达过上海。^⑧ 对路翎而言，之所以要以一·二八战争作为全书开篇的背景，或许与他本人的少年记忆是分不开的。1932年1月淞沪抗战爆发，当时年方九岁的路翎就读的学校“响应社会民主人士宋庆龄、邵力子等的号召，征求学生自由报名往上海服务”，对此，“路翎自愿报了名。但因年龄小，经杨美老师的说服而未去”。^⑨ 这或许就是“主观战斗精神”最理想的案例。即便作家自身的经验未被完成，但它提供了一个连缀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能动方向（也即胡风所谓“人民的潜力”），人物可以沿着这个方向完成作者未能完成的使命，奔赴上海的行为虽然在现实中未能实现，却指向连续精神状态的惯性推动下历史发展的动向。由此，作家既未让历史书写流于表面，也成功地深入了“感性对象”，写出了符合历史规律的心灵动态。

但这种方法是否适用于一切“感性对象”？答案应当是否定的。上述所有历史事件，作家的目标对象往

①②④ 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胡风全集》第3卷，第487、487、532页。

③ 胡风：《〈财主底儿女们〉序言》，第2页。

⑤ 胡风：《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胡风全集》第3卷，第187页。

⑥⑦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6、7页。

⑧ 1946年在胡风邀请下路翎第一次来到上海，参见陈思和编：《史料与阐释》，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299页。

⑨ 张以英：《路翎年谱简编》，张以英编：《路翎书信集》，第190页。

往只是亲历者/目击者，而非真正参与到历史中心地带的人物，一旦作者面对真实的历史人物时，这种创作方式就暴露出了它的问题。比如，书中提到蒋少祖拜谒陈独秀，对陈独秀的描绘就显得有点诡异：“陈独秀毫未寒暄，开始谈话，在房里疾速地徘徊，从这个壁角跑到那个壁角，显然他内部有焦灼的，不安的力量在冲击，并显然地企图控制它。”^① 路翎的这段描写其实来源于舒芜的转述，舒芜在少年时代曾有机会与陈独秀同住，观察到陈独秀每天清早总是“在厅堂上来回走，先是缓步，走着走着快起来，最后就成了跑来跑去，每次都是这样。……后来我把这个印象也跟路翎谈过，他就把它加工了一下，写到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中去了”。^② 当需要表现的历史对象从“事件”变为“人”，作者几乎是迫不及待地用“主观战斗精神”向中心人物“突进”了，但仅通过转述的只言片语就将陈独秀定格为一个“内部有焦灼的，不安的力量在冲击”的形象，显然既不符合客观的历史人物（舒芜强调“整个场面是路翎虚构出来的，写陈独秀见客时也踱步奔跑，那是路翎的艺术创造，不是我说的”^③），在作品中也显得有些突兀。如果过于相信并依赖创作主体的“精神力量”，那难免会使创作有失真之处。

另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是汪精卫，他在小说中的首次出场是与日本特使一起检阅“宁海舰”，海军部就职的汪卓伦负责接待检阅。从汪卓伦的角度而言，这一次检阅让他感到强烈的屈辱和悲愤，从此在心中埋下了强烈的民族爱憎观，这种写法仍然指向前文所述的“广大人民的负担、潜力、觉醒、和愿望”的连续性生成过程。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作为历史对象的汪精卫被作者推至台前，全方位地正面展现他的一举一动乃至心理活动：“忧戚”“柔弱”甚至“娇媚”的汪精卫“在内心里把微贱的民众和抽象的国家想象成他底中世纪的情人”，因此设计出这么一次“颓废派艺术的外交”，企图借此打动日本特使——作者显然是为了表现1934年汪精卫暧昧的对日态度，由此及彼地展现“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暧昧地起伏着”的历史情形^④。不难见出，相比于体积庞大的历史事件，作者明显更擅于、也更倾向于捕捉以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对象，而且不惮于用描绘虚构角色的方式同等程度地“体验”真实历史人物的内心状态。但作为政治事件的中心人物，集中展现汪精卫心理层面的扭曲和优柔寡断显然并不能切中历史的核心，也无法全面地展现该时段的中日关系，只能是文学书写历史的权宜之计。

向前回溯，这种创作倾向来自对“感性对象”的追求，而对“感性对象”的追求又站立在“每一个人是一个性格，一个‘感性的活动’，‘社会关系的总体’”^⑤的历史观上，因此，当作者试图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对象化描写时，要么将其寄托在虚构人物的“感性”世界中，要么就直接突进历史人物的精神图景。历史经验的确由“人”组成，但“人”作为实践的主体，既应有纵向上的心灵变化，也应包含横向上的社会关系和实际活动。尽管胡风反复强调“人是社会关系的总体”，但在创作中，一旦作者对人物精神世界的描述一发不可收，那么相应地，关于其社会实践的情节占比就会大大降低，这就造成了体验现实主义表达历史的失衡之处。相比于人物之间爱恨情仇的你来我往，更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站在自己的精神围墙里痛苦地自言自语。再回到前文，蒋纯祖理解社会现实的主要方法就是以一个又一个的人物为媒介，根本原因也就在于此。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漫长旅途中经历的一幕幕画面在脑海里不断闪回，画面的中心内容就是代表着不同群体的不同人：“在迷糊中他明白自己底软弱有着恐怖，同时他看见了无数的人们。他看见了朱谷良和石华贵，蒋少祖和汪卓伦，看见了高韵，陆积玉，万同华和孙松鹤。”^⑥ 足以见得，当他叫喊着“我想到中国！这个……中国”离开人世时，“中国”的形象仍然由这一个个作为对象的、孤立的“人”攒聚起来。事实上，这种创作形态背后正是胡风对阶级形态的理解：“阶级内容是以具体的活的诸成员为内容的，仅仅近似地表现着他们每一个个体，每一个阶级成员是在这一或另一路径里面的阶级内容。”^⑦ 在很多时候，文艺创作的确不得不以“典型人物”为代表来表现现实，但如果过于依赖个体的象征作用，那就忽略了胡风苦苦寻求的“血肉的历史”的现实生活内容，两者反而自相矛盾了。

（责任编辑：张 瑾）

^{①④⑥}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645、326—327、970页。

^{②③} 舒芜口述、许福庐撰：《舒芜口述自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75页。

^{⑤⑦} 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胡风全集》第3卷，第549页。

“A Struggling Symphony” and the Imagined “China”

—— Re-reading *Children of the Ri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

WANG Xing'ai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reads Lu Ling's novel *Children of the Ri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ational issue, exploring the unique presentation of the “China” concept and the national imagination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work. In the text, the word China often abruptly appears in the characters' speech and thoughts, breaking the daily narrative and forming a complex picture of national imagination. Jiang Chunzu's national imagination swings restlessly under the tempering of reality and the test of love, revealing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nation depicted throughout the book. The novel writes history through the spiritual world of the characters, presenting the dynamic proces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its shaping effect on the growth of the subject. Although it has the limitation of over-reliance on subjective imagination, it vividly presents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spiritual predicament of intellectuals during the War.

Key words: Lu Ling, *Children of the Rich*, Hu Feng, the subjective fight spirit

(上接第 97 页)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Community Safety Resilience in Urban Areas Driven by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y

YE Lan, DONG Youhong

Abstract: Cities, as high-risk zones characterized by concentrated vulnerabilities, require enhanced community safety resilience driven by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to strengthen their capacity to withstand internal and external risks. The improvement of community safety resilience in urban areas follows an underlying logic driven by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that facilitate “actor-information” interactions. Both “actor composition” and “information transfer” serve as decisive factors in boosting community safety resilience, either individually or collectively;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indirectly enhance resilience by optimizing actor collaboration and information flows, or by refining the synergis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dimensions. Based on differentiated combinations of “actor composition” and “information transfer”, four distinct types of safety resilience enhancement strategies can be identified. To promote community safety resilience in urban areas, it is critical to prioritize the deep coupling of “actor-information” dynamics, elevate collaboration among intra-sector or cross-sector actors, and leverag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unique capabilities—particularly in risk monitoring, early warning systems, and coordinated emergency response mechanisms.

Key words: community safety resilienc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ctor composition, information transfer